

doi 12 3969/j issn 1672-0598 2010 02 020

论四史写人艺术*

汪耀明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四史写人能选择典型事件, 写出矛盾冲突, 重视语言描写, 显示心灵深处, 描绘生活细节, 注意场面描写, 运用多种表现手法, 记载人物作品, 力求将写人、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 从而逼真地塑造了历史人物的形象, 生动地刻画出他们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中图分类号] I0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10)02-0118-05

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源远流长, 历史典籍卷帙浩繁。其中,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和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合称“四史”。它们是珍贵的历史巨著, 又包括许多优秀的传记文学篇章, 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 充分表现出写人艺术的成就, 从而出类拔萃于文化典籍之林。

四史在人物描写上的成就, 首先表现在善于通过典型事件来刻画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使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它们不是细大不捐地再现人际关系, 而是从塑造历史人物形象出发, 对材料进行审慎的选择, 舍弃与人物活动本质无关的次要事件, 着重记载最能展示人物性格特征、反映事物本质特点的主要事件和重大活动, 使人物在这样的事件和活动中成功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充分显现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特点。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随从刘邦转战南北、平定天下、巩固西汉政权的事迹。作者主要写他用贵重财宝诱惑秦将而大败秦军, 串通项伯设法帮助刘邦, 说古道今以反对刘邦复立六国后世, 建议迅速分封雍齿以安定人心, 主张请商山四皓来保全太子等。这就生动表现了一个杰出谋士的形象, 充分显示出他富有远见、运筹帷幄、多谋善断的特点。至于对刻画张良主要性格特征关系不大的情节, 司马迁就省去笔墨了。他说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 非天下所以存亡, 故不著”^{[1]2047-2048}。对

此, 方苞指出, “此三语, 著为留侯立传之大指。纪事之文, 义法尽于此矣”(《方苞集》集外文补遗卷二《读书笔记》)^{[2]853}。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主要记叙霍光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完成辅佐昭帝、废黜昌邑王、拥立宣帝三件重大事情, 通过这些大事形象地表现了西汉中后期这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一生, 传神地展示出他稳重审慎的性格特点。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从汉末群雄争战中兴起、剪除群豪并统一北方的历史, 侧重描写他讨伐董卓、活捉吕布、消灭袁术、打败袁绍、扫除刘表和平定马超等大事, 这就写活了三国时期这位重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展现出他高超的军事谋略和卓越的指挥才能。

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的真正内心世界, 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 这是四史写人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四史作者写人物传记时, 注意把所写对象置身于其所处环境的矛盾斗争之中, 叙述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写出人物对矛盾斗争的认识和作为, 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他们的社会作用。这样随着矛盾冲突的充分展开, 就使人物形象如雕似镂、人物性格披沥无遗。

《后汉书·班超梁懂列传》有关班超事迹的部分, 可以说是范晔在矛盾斗争中写人的一个范例。作者主要通过班超与周围环境、与其他人事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性格。投笔兴叹反映出理想与现

* [收稿日期] 2010-02-14

[作者简介] 汪耀明(1953-), 男; 博士, 副教授,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实的矛盾,显示人物胸怀大志;消灭匈奴使者、促使鄯善归顺反映出汉朝与匈奴的冲突,表现人物见识高超、做事果断;多次平定西域地区贵族叛乱反映出汉朝与西域贵族的斗争,突出人物百折不挠、善于用兵。作品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汉朝与匈奴及西域贵族的矛盾斗争中展现人物的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写活了慷慨激昂、立功西域的班超形象,并产生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比较全面地描写了陆逊这个历史人物,尤其是写了他领导的针对刘备的夷陵之战。刘备起兵伐吴,初战告捷,凌厉攻势震惊整个吴国。陆逊领兵抵抗,面临尖锐的矛盾斗争和复杂的人事关系。他对吴蜀矛盾有清醒的认识,承认蜀军处于优势而吴军处于劣势;同时,创造条件,巧妙用兵,克敌制胜,终于一举击败刘备,为稳定孙吴政权建立了功勋。他对吴军将领内部矛盾能妥善处理,以正确的道理和取胜的事实使吴军众将心悦诚服,同舟共济。通过这些矛盾斗争的精彩描写,人物智勇兼备的特点得到充分表现。正如李景星所说,陆逊“生平出色处,只在破蜀先主备”,“破蜀是逊传主文,传于其计画处、布置处、内而暗慰孙权处,外而故疑诸将处,摹写唯恐不尽”,刘备是“曹魏君臣竭尽全力所不能制者,而以一书生断其死命,从容闲瑕,行若无事,此是何等神力”,“吴之得保有江东,实以此故”(《四史评议·三国志评议》陆逊传第十三)。^{[3]453}

以声口毕肖的人物语言来展现人物的心理和感情,使人物形象个性鲜明独特而丰富复杂,这是四史写人艺术的又一重要特点。人物总是根据各自的语言习惯来说话,而各自的语言习惯又是由他们的生活经历、思想性格所形成的。四史作者在描绘历史人物形象时,注意把握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来写出他们在特定环境下所说的展示内心的语言,这样就使人物的语言具有严格的独特性和丰富的表现力。

《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时的盛况,他就说:“彼可取而代也。”^{[1]296}这显示出力能扛鼎、才气过人的项羽确实是大胆而直率的。正如王鸣盛在评论刘邦与项羽观看秦始皇的言谈时所说,“项之言悍而戾”(《十七史商榷》卷二《史记二》)。^{[4]12}项羽有雄心大志,而且勇敢无畏,但是他的性格又有残酷暴烈、恃力弃智的一面。楚汉对峙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

公。’”不久,项羽又对刘邦说,“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5]327-328}这些语言就表现出项羽性格的这一面,也说明了他转胜为败的原因。

《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写刘备采用庞统的计谋,成功袭击刘璋后设宴庆功。他“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退出!’于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5]955-956}庞统所言表明他既对自己议取西蜀颇有内疚,又对刘备称乐之言有些不满,于是他率而应答。然而,他还是敬重刘备,维护对方尊严。因此,他用“君臣俱失”之言使气氛活跃欢乐,也暗示刘备不无过失,这就出色地显示了谋士庞统天性聪敏、胆略过人、不卑不亢、从容不迫的特点。

四史比较注意人物的心理描写。它们常常从塑造生动逼真、富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出发,或由人物自己内心独白,直接打开心灵的窗户,或随着对人物神情、姿态、语言、行动以及相关景物的描写,深刻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心理状态和思想矛盾斗争的历程。这样的心理描写就使四史传记中的不少典型人物显示出鲜明独特的个性,具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曲尽其妙地描绘了朱买臣拜官的情景。他先穷后达,“拜为太守”,还是“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当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观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6]2792-2793}作品通过有意“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少见其绶”、“徐出户”、“乘传去”等外部行动,传神地写出了朱买臣炫示自己显达的心理活动,又从众人轻视、大呼“妄诞”、疾呼“实然”、惊骇、列队拜见等前后不同的神情动作中,绝妙地提示了周围人物前倨后恭、趋炎附势的内心世界。

《汉书·外戚传》写到李夫人“病笃,上自临侯之,夫人蒙被”不见,“上复言欲必见之,夫人遂转

乡歔歔而不复言”。以后,李夫人说:“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以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上所以拳拳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6]3951-3952}这一段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人物的神态、动作和语言,表现了李夫人死前的固宠心计,反映出作者在心理刻画上的较高水平。

以生动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使人物活灵活现地浮现在人们面前,这是四史写人艺术的突出方面。四史作者常常根据对人物性格的理解,描写与人物活动密切相关的生活细节,从而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这样的细节描写不但增强了人物描写的真实性和生动性,而且表现出人物独特的个性、情感的变化和事业成败的关键。

《史记·张仪列传》写张仪至楚游说不果,反被“笞掠数百”。回家以后,“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1]2279}这就形象鲜明地突出了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周游各国、追求名利、受挫不馁的狡黠性格。

《史记·吕不韦列传》写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由经商走上政治舞台的情况。当他发现秦昭王太子安国君之子子楚留在赵国为人质、境遇不佳时,就“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1]2505-2506}如此生活细节极为准确传神地表达了吕不韦善于投机的商人特点,写出了他善于把经商长处变成政治行为的过人之处。

《后汉书·冯岑贾列传》不只写出了贾复表示破敌吃饭、背着弓箭、抢先迎敌、所向披靡等情景,并且还用要求击郾的细节刻画出人物的性格。“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诏诸将议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为次,谁当击之?’复率然对曰:‘臣请击郾。’帝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大司马当击宛。’”^{[7]666}这里率然作答的神态有些焦躁,不过知难而进的个性显而易见。“臣请击郾”的语言表示必胜的信念,活画出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形象。

聚焦事件进程的典型场景、情节发展的高潮部分和人物活动的精彩片断,通过细致的描绘和丰富的画面,最集中、最充分地显现意义重大、特征明显、趣味盎然的某个场景,反映各种矛盾冲突最激

烈的阶段,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面貌,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具体可信,这是四史写人艺术的可取之处。

《史记·田单列传》记叙田单坚守即墨、战胜燕军的过程,突出他巧用火牛阵的战斗场面。田单挑选千余头牛,把它们打扮得稀奇古怪,在牛角上绑上尖刀,在尾巴上缚着浸透了油的芦苇。他趁着夜间,把尾巴着火的狂怒牛群赶向燕军。齐国的士兵奋勇杀敌,百姓呐喊助威。燕军惊慌失措,大败而逃。作者把这一场面描绘得如此真切、精彩,实在是传神地写出了田单的足智多谋。

《后汉书·光武帝纪》善于选择昆阳之战发展过程中的典型情景,绘声绘色地描写出以少胜多的动人场面和在大战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刘秀形象。正如王夫之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8]127}当时,驻守昆阳的起义军势单力薄,处境危险,而王莽军队声势浩大,“列营百数”,“旗帜蔽野”。他们的将领“意气甚逸”。刘秀在被围议事时,力排众议,主张“并力御之”,还具体“图画成败”。接着他仅带少数人冒死突围,去外面调集援兵,尤其向“贪惜财货”、不愿出兵的将领讲清楚道理,分析得失,于是,“众乃从”。最后,大战的时刻到来,刘秀“遂与营部俱进”,他冲往敌阵,所向无敌,再次进击,连续获胜,还“与敢死者三千人”去“冲其中坚”。这时,“城中亦鼓躁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因此,“莽兵大溃”,^{[7]6-8}刘秀他们大获全胜。作者把兵力和人心、城里和城外、声响和天气、王莽军和刘秀一方等融为一体,尽情描摹,其中着力突出刘秀的表情和言行,从而生动地描述了昆阳之战波澜壮阔的场面,成功地展现出刘秀多谋善断、勇敢无畏的性格特征。

调动各种表现手法刻画人物,使历史人物生动逼真、富有立体感,这是四史写人艺术的显著特点。作者常用对比、烘托、照应、渲染等手法来加强人物形象描写,突出人物本质特征。尤其是作品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人物活动的环境、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状态展开细致入微的描写,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和巧妙的烘托,使各自不同的性格在对比中交相辉映,也使人物的情态特征在烘托中给人留下浮雕般的印象。

对比手法比比皆是。《史记·李将军列传》将屡建功绩又遭遇不幸的西汉名将李广与不同人物进行多方面的对比:与射雕者的对比说明他射技盖世,与程不识的对比显示他胆略超人,与部下吏士

的对比表现他英勇无畏,与李蔡的对比反映他功高赏薄。这样多处运用对比,就使李广在与别人的比较中显现出独特的风采。

烘托手法显而易见。《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采用侧面描写,刻画卜式形象。它以弟弟的败家破产来衬托卜式的擅长经营,又以丞相的片面认识来烘托卜式的胸有全局,还以武帝对卜式的逐步认识、任用的过程来映衬卜式对国计民生的关心。通过层层描绘和烘托,这位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就清楚呈现出来,令人难忘。

照应、渲染等手法不一而足。《史记·苏秦列传》开头写出这位历史人物游说不成,困而归家的窘态。以后,他春风得意,佩六国相印而归。对此,作品的结尾照应开头,又一次写到苏秦家人。他的“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1]2262}《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以生花妙笔,对范雎的一段离奇经历展开具体入微的描绘和引人入胜的渲染,鲜明地表现了一个擅长言谈、工于心计、忍耐待变的策士形象。

引用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把它们融入人物传记,使之成为整篇传记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有利于人物形象的描绘,这是四史写人艺术的独到之处,所引用的作品主要有诏令、奏疏、文章和辞赋等,它们是作者生活经历的自我反映,也是其思想感情真实而全面的表达。人们可以从中更清楚地观察历史人物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活动情况,更深刻地了解人物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特点。

《汉书》比《史记》更多地引用与人物有关的学术、经世的文章和辞赋作品。它收录了贾谊、晁错、邹阳、司马相如、公孙弘、司马迁、东方朔、刘向、扬雄等人的许多文章、辞赋。详载人物的作品,就能比较具体地反映他们的生平和思想,从而写活人物形象。正如章学诚所说,汉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文史通议》内篇一《诗教下》)^{[9]80}。刘熙载也说:“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艺概·赋概》)^{[10]96}

《后汉书》从《汉书》记载诏令、奏疏和文赋的写法中得到启发,也大量引用了东汉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代表性作品。这不仅保存了一批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有助于人们了解东汉历史人物的气质和习尚。《后汉书·班彪列传》详载班彪、班固的著作,表明人物心志和水平。《后汉书·王充

王符仲长统列传》和《后汉书·崔骃列传》记载王符《潜夫论》中的《浮侈》等篇、崔寔《政论》的一些内容和仲长统《昌言》中的《理乱》等篇,表现出汉末这些文人学者指斥时政缺陷、暴露现实矛盾的勇气。

四史描写人物形象,常与叙述事情过程、议论是非得失、抒发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写人结合叙事,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影响事情的波澜起伏,又写出事情的变化表现人物性格的光彩。写人、叙事结合议论,评说人物立身行事的美丑善恶,展现其闪光之处和善良心地,点明其不足之处和阴暗心理。写人、叙事、议论也结合抒情,叙述褒贬人物事件,充满深厚情意,进一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四史写人、叙事、议论、抒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以叙事来写人。《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写诸葛恪,一开始就写他巧妙应对孙权的事。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脸长像驴,孙权大会群臣,就叫人牵一头驴进来,并在驴脸上标明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过几天,孙权要诸葛恪比较其父亲和叔父的才能,诸葛恪认为“臣父为优”,他强调“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对方听后,喜形于色。孙权又叫诸葛恪为众人依次斟酒,张昭已有醉意,就以养老之名不愿再喝。诸葛恪反驳张昭说:“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5]1429}一席话说得张昭无话可说,于是满满喝了一杯,作者描写诸葛恪益字、论人、劝酒这些事,就传神地展现出他才气横溢、思维敏捷、能言善辩。

叙议结合,评价人事。《后汉书》的序和论富有文采,善用叙述和议论相结合的方法,在简洁生动的叙述史事中,评价人物事件,表现出作者的鲜明倾向。《后汉书·李杜列传论》在传记叙述李固直陈外戚宦官专权之弊,因一再议立清河王而为梁冀所害的史事基础上,作者发表了对仁义和杀身成仁的看法:“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寡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

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7] 2094-2095} 作者认为为了尽臣节以报效国家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就要提倡仁义名节和杀身成仁之美。因此,他肯定李固不顾个人安危,“据位持重,以争大义”,高度赞扬其以身殉国的精神。这些议论不仅突出地反映了范曄的思想观点,也深刻地展现出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

抒情依附于叙事、议论、写人。范曄满怀深情,擅长咏叹,往往用抒情的笔调来记载人事,写作序、论,使字里行间涌动着感情的激流。《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说:“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若夫高冠长剑,纁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媼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缙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7] 250-2510} 作者痛恨宦官把持大权、广树党羽、

重用亲信、陷害忠良、搜括民财、骄奢淫逸。他把这些思想感情倾注在对宦官群像的描绘上,融合在对与宦官有关的事件进程的叙述中,体现在对宦官作为的入木三分的议论里,并把写人、叙事、议论和抒情融合起来,从而曲尽其妙地反映出东汉后期宦官独揽朝政、恣意横行的情况,使人们感到作品形象鲜明、事理清楚、感情充沛。

司马迁、班固、范曄、陈寿从先秦诗文中有所受益,创造性地进行了人物描写。他们能根据实录精神,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秉笔直书,能注重人物的经历、言行,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力求历史和文学的有机结合,能灵活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出色表现人物的品行和气质,使人物形象丰满、个性突出。四史人物描写的成就大大充实和发展了写人艺术。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 方苞. 方苞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3] 李景星. 四史评论[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4]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 [5]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6]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7]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8] 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9] 叶瑛. 文史通义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0]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责任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On the Figure Depicting Art in the Former Four Histories

WANG Yao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Historians selected typical events to depict historical figures when they wrote the Four Histories. They laid emphasis on language description, portrayed details in daily life, paid attention to the spectacle depiction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and reveal the innermost being of the characters. In addition, they used various techniques of expression to record personages. They endeavored to combine character depiction, narration, argument and lyricism so as to portray imag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depict their personalities in a vivid way.

Keywords Historical Records; The Book of Former Han; The Book of Later Han; The Record of the Three Kingdoms